

改革决策取决于人民利益

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那么,制定改革措施如何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推进决策落实怎样以人民利益为指引?

“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深化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改革如何实现人民利益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彰显了人民性这一改革的最高价值和行动准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

增进人民福祉是贯穿的主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就是怎样确保改革不断为百姓带来利益。现在,改革决策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强大市场已经形成,各级领导干部所需要做的就是,以人民意愿为制定具体改革措施的前提基础,以人民利益为推进改革落实的行动标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进改革如何破题?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痛点就是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的切入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

策,必须建立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决策前要听取百姓的意见诉求,决策中要以群众利益为标尺,对如何保障群众利益要有制度性安排,对决策的社会影响要科学考量,改革效果要客观评估,群众是否满意要随时倾听。各级干部务必深入群众一线,聆听群众心声,汲取群众意见,提高决策科学性,最大限度求共识,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更好地体现群众诉求、实现百姓利益。

哪个领域的改革百姓最期盼,就从哪个领域抓紧改起。哪项措施最有利于实现群众切身利益,就赶快推进哪项措施。去年扩大“营改增”试点,就给企业减负1500多亿元。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

值税和营业税,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我们说,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让改革在实现人民利益上立竿见影,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实现人民利益越越快,人民群众就越坚定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越能赢得民心。改革遇到困难和挑战,人民就会和我们一块儿应对一起扛。

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改革就如同无水之舟、无土之木。改革决策始终以人民福祉为念,推进改革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开,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赢得良好开局,推动新一轮改革轻舟越过万重山。 人文

终结审批长跑 亟待地方改革提速

全国两会期间,成龙在政协小组讨论时说,“我给别人的印象感觉或在中国内地很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推来推去,快8年了,都没办完手续,我准备放弃,不要这块地了”。

成龙的一席话像先前的“人在证途”“审批长征图”一样,再次点中了审批难、办事难的症结。不过,从电影明星口中道出,让人别有回味,因为在公众眼中人脉甚广的名人况且如此,普通群众和权力打起交道岂不更是苦不堪言。

在网络上,有人说成龙的“8年之难”,说明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心理上稍有平衡。不过,名入也好,普通人也罢,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法治文明的象征,但在负重十足的办事难面前,这样的平等还是不要最好。审批当然要走程序,需要花时间,但这绝不能是8年。一块亟待开发的土地,如果只能“躺着睡大觉”,是生产要素的闲置,影响经济效益。可以说,面对行政审批难,无人能够幸免,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改革的节奏需要加快。

人们看到,过去一年,中央政府在率先示范简政放权上是卓有成效的,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只用一年时间即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简政放权承诺。虽然中央政府改革步调之快让人惊叹,力度超过预期,但公众对改革

的切身感受还不明显,在两会上对审批难的吐槽也不时出现。

这是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拥有更多错综复杂的审批事项,而且越往下越出现叠加趋势,职能重叠、舍不得放权等问题还存在,而且在接新放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仍处在调整之中。不过,地方政府的改革面广、量大,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如果只是头扭身不转、转身节奏慢,那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成效就大打折扣,也会让公众产生“假改”之感。

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作为改革上篇,已经让公众看到了改革的决心与魄力;作为改革下篇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抓紧时间让公众看到改革成效,加快释放市场活力的步伐。到目前,上海、山西、海南、成都、兰州等10余省市都已制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年度计划,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前必须要做好的就是列出行政权力清单,以公开透明之举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倒逼改革提速。

2014年,公众的关注点一方面在于新的一年中央政府如何啃“硬骨头”,如何继续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的审批项目,另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地方政府如何跟进改革步伐。很显然,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能让社会对政府自我改革的期待耗费太长时间,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步伐亟须加快。 马钰朋

期待更多来自底层的声音

两会结束了,但两会上的话题,依然值得咀嚼。很直观的感受,两会上很多话题,照例是高大上档次上的。壮士断腕、破除藩篱、改革红利、市场决定、混合所有制、科技创新、雾霾治理,如此等等。

回味起来,直接说及底层的话题,脑子里就没有多少了。我不知是这样的话会上本来就没谈之,还是谈了没触碰到媒体的兴趣。这几天特意寻了寻,底层话题倒也不是没有,只是确实少,而且说过去水波不兴。

黑龙江的那群代表说,好多40、50岁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想再就业特别困难,有些甚至没有钱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她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这些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企业,这些职工下岗后既没有学历又没有农民工的体力,技能单一,上有老下有幼,靠他们自己改变生活现状很困难”。

山东的孙建博代表反映,延迟退休让工人很担心,对有些人来说,不是延迟退休而是该提前退休,比如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等工作的特殊工种,因病或者因工致残的工人。西安的王曼利代表说,公交车司机在驾驶室保持一个姿势往往8小时以上,他们50岁以后精力体力锐减,希望允许公交车司机提前5年退休。

这些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或许他们也有对高大上话题的关注,但也把底层的声音带到了会场中。但关注底层的,也有来自精英阶层的委员。

舒红兵委员是武汉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他说,刚回过重庆农村的老家,学生仍是摸黑上学,摸黑回家,往返十里山路,跟自己40年前一样,而且现在撤并村小学,上学距离更远了。农村山区的家庭,年轻一代都到外面打工,留

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这些家庭幸福在哪些地方?

高大上的话题固然重要至极,但底层的真实也同样是需要面对的。今日的话语场上,高大上的话题有着绝对的优势,底层的贫困和艰难却也不能边缘化了。两会上,有许多官员、学者、企业家和娱乐明星,数量远远超过工人和农民。即使工人和农民,在两会上也难成气场,其话题的关注也可能被汇聚到高大上的话题上;媒体也常常会被高大上气场设定了。

高歌猛进的现实下面,有一个贫困困难的现实,两者何为主流?但纵使贫困是局部的,也不应忽视。如果两会上有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话语的比重又会怎样分配呢?现在不少人的观点就觉得选拔基层的委员上来,他们的素质不高,履行职务的能力很差,舒红兵委员说,“不一定有能力,但是要更有代表性。”这难道不是正当的道理?

这个社会再也不用担心成功人士的意见不能得到反映,成功学的流行既是成功者才可登堂入室的佐证,也显示了成功者作为倾慕对象和奋斗标杆的社会趋势。舒红兵委员不解,“我们的博士生为什么不回村里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写一篇30年、40年以来的调查,调查这些人是怎么出生的,怎么长大的,怎么上学的,怎么工作的,怎么生活的,怎么病死的”。这有什么不好解释呢。当大家都习惯于向成功行注目礼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这样的社会调查题目?

底层失语,失去关注,会悄然成为社会的结构性选择。在其安排下,在各种社会事务上呈现缺席,这是必须被警惕的命题。

刘洪波

据调查,北京蓝色港湾“禾绿回转寿司”餐厅,使用多种过期食材;猪扒发黑发臭,主管竟说“没事继续使用”;过期盒装豆腐,刮了保质期做菜;重复回收使用的黄瓜丁已长白毛……店长称变质食物少放顾客吃不出来。(3月14日《京华时报》)

食品安全不能只有“3·15”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产业背后黑幕频现,虽然每年的“3·15”总会揭露一些消费陷阱,但是对于吃的是否安全的问题,一年365天,人们从来不会含糊。人们惊奇地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似乎涉及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公众的质疑不得不从一些路边摊和街边小店,延伸到我们曾经信赖的餐饮品牌,心理防线节节败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团结稳定,影响着民族的发展和未来。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同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曝出,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从新闻暗访曝出,而不是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公众的疑虑何时能打消,怎样才能打消,追根溯源,还是要从制度建设上寻求答案。

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彰显出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和意志。最严格的监管就是对整个食品消费领域全程建立起更加科学、严密、标准的治理体系;最严厉的处罚就是要大大增加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一旦发现违法行为要进行一并惩罚,加大惩罚力度;最严肃的问责,就是要追究食品安全监管者自己失职行为的责任,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体现。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千家万户,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大事,这根弦任何时候都要绷紧。食品安全问题领域呈现出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让人们防不胜防、力不从心。在问题没有被曝出时,人们是闭着眼睛吃、揪着心吃,当问题被曝出来之后,人们只有愤怒和无奈。在整个过程中,人们似乎总是在被动地接受,愤慨甚至是无助,而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让每一个人能够便利地参与到监管中来,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不能只有“3·15”,而是要让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分钟、每秒都成为“3·15”,建立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可追溯体系,让每一个监管者必须时刻警醒自己肩上的责任,让每一位民众都能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让每一个食品经营者不得不面对法律和公众的审视和监督。 宋华

“制播手机恶意软件”不能仅止于曝光

央视的3·15晚会,曝光了以鼎开、大唐旗下高鸿等为代表的公司,通过手机经销商把带有恶意程序的软件提前预装进手机,它在用户不知情情况下远程控制用户手机,不仅会恶意扣费、骗取流量,还会泄露用户的隐私信息。它们不止存在于山寨手机中,正品行货也无法幸免。

据查,恶意软件“大唐神器”生产商——高鸿,还是上市公司大唐电信的子公司。而今,“大唐神器”拥有4600多家加盟代理商,每个月能安装100万部以上的手机,已经安装的软件超过4600万个。另一家恶意软件生产商鼎开,其每个月装机量达到130万台。看上去,用户每个月可能被扣几元几十元。但仅这次被曝光的两款软件,其受害者就达到千万级别,其案值可能亿元以上,绝非小案。

更可怕的是,数以千万计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境下,这当然不能大事化小,仅由工信部罚款了事,或涉事公司做些不痛不痒的道歉来平息风波,而应对其按刑事犯罪予以严惩。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等罪名。两高于2011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设备,都属于“计算机系统”,即非法侵入、控制手机,也算是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系统。

因此,对于3·15晚会上曝光的电信企业通过手机恶意软件,控制手机、盗刷流量、窃取隐私的行为,有必要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立案追究;恶意软件的制造商也应按“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而在通信犯罪风险剧增的当下,公检法部门也应提高警惕,对这类犯罪行为行惩前毖后。

如今,手机恶意软件已登上曝光台,希望公安部门敢于亮剑,法院通过此案树立打击类似犯罪的司法标杆,以儆效尤,而不可在轻纵中,形成“破窗效应”。 袁伊文

校长打折卖职称



《京华时报》报道,老师想要评职称,得先和校长花钱买名额,这在安徽省宿州市第十九小学已成为老师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而按照“惯例”,职称名额由校长“标价”,遇特殊情况还可以“打折”。该校徐校长私下里将握在手里的助教高级职称名额叫价1万元暗箱,求购者嫌贵,便大幅度地打了八折,8000元成交。目前涉事徐校长已被停职,接受纪委调查。

吴之如 文/画

影视创作最缺乏的是尊重

近日,宋丹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拍戏不是拍剧本”的观点。《美丽的契约》编剧宋方金发表长微博,矛头直指主演宋丹丹片场随意改戏、将个人凌驾于角色之上等做法,造成作品呈献走样,喜剧变成了闹剧。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3月15日《北京青年报》)

如果把由宋丹丹和宋方金引发的争论,引向“拍戏要不要剧本”,那显然犯下了方向上的错误。一个演员真的认为自己不需要剧本,那就是自狂得自残了。影视圈中自狂和自残的人不少。宋丹丹在最新回应表示,“我从来没说过拍戏不用剧本”,也证明了这一点。

剧本很重要,但没有不可改的剧本。这一段时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大火,很多人就此说,认为韩剧很重视剧本,编剧很有话语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韩剧的剧本也并非不可更改。一个细节可以证明。韩剧有时会就剧情走向征求观众意见,最终的结尾甚至“观众说了算”。这是讨好观众的一种做法,这也说明剧本并非不可更改。更何况有些演员确实很有才华,在拍摄中有自己的思考、思想,适当更改剧情乃至台词,实为锦上添花,改改又何妨。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改,到底是基于什么?宋方金在微博中讲:“谁有话语权,谁就会改剧本。除非有行业法规限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谁拳头

大谁说了算。”如果现实中,编剧的拳头足够大,那编剧就会得到尊重;如果导演的拳头足够大,那基本是听导演的;如果演员的派头足够大,那自然是演员说了算。这就是一种歪风,由此支撑下的剧本,无论改与不改,都是问题。

这里,关键是一个尊重问题。尊重首先是编剧和演员的相互尊重。创作是很主观的,不可能制定一个规范,明确一个剧本,可能改多少不可改多少。只有编剧和演员相互尊重,这样才能取得最大公约数。在影视创作中,习惯上编剧处于弱势地位,一些演员有着傲慢与偏见。现实中,一些演员对编剧缺乏基本的尊重,这里太多的故事,可以继续听编剧和演员“剧透”。因此,这里的尊重虽然是相互

的,但就现实而言,更重要的是演员尊重编剧。

其次则是对观众的尊重,这也是最大的尊重。换句话说,改与不改,都应该基于把戏拍得更好,更受到观众的认可。问题正自于此。现实中,一些演员甚至编剧,对观众缺乏基本尊重。一段时间以来,清宫戏跟风,“抗日神剧”横行,都体现了这一点。所谓职业编剧和职业演员,职业应该包括精神和能力两个层面的意思。正如宋方金所讲,“作为一个职业演员,应该尽量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而不是让人物来适应地”——这就是能力,除此之外,更应该学会尊重两字,自己所做的一切应该对得起这份职业,应该不辜负观众。一种做法,也就不必只看外国了。

尊重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影视创作最缺乏的就是尊重。尊重不是先天而来的,需要多方培育,而讨论正是一个生成方法。这一意义上讲,影视创作需要这场大讨论。无论双方观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心平气和,能够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双方学会相互尊重、共同尊重观众,也就达到目的了。 毛建国

中国房价的疯狂时代正悄悄谢幕?

说等等,不一而足,广大公众如坠五里云雾。

首先,房价整体崩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且不论中国城镇化远远没有完成,刚需旺盛,加上货币超发导致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百姓投资渠道无比狭窄,以及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尚未理顺,地方债务高企、银行坏账危机重重,房价一旦全面崩盘,必然引发恶劣连锁反应,危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尤其是热爱投资房产的新兴中产阶级将遭受空前劫难,中低收入人群却很难从中获益。以一线城市动辄几万一平方米的房价为例,下跌一半,中产家庭资产会大大缩水,而普通百姓仍买不起,会继续抱怨政府、吐槽房产商。

在分类调控之下,中国房价未来会呈现复杂化、区域化、地方化的趋势,不仅提醒房产商,也提醒购房者更加小心,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一句话,真正考验大家智慧的时代来了。一线城市房价由于畸高,调控出于社会稳定等需要,持续快速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调控短期不会放松,会呈现平稳态势。

二线城市总体温和上涨。主要因为一线城市人口负荷沉重,环境资源危机加

重,对外地人口的进入日益缩小重点,因此二线城市会成为投资房产的热点。

而三四线城市整体发展与公众期望值距离甚大,短期难以吸引更多人去就业定居。但由于房价由地决定,三四线城市即使出现鬼城的概率较大,也会走向分化,越靠近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越有承接产业转移、分担人口压力的优势,房价必然随之升温。

如果中国商品房房价最终回归市场规律主导的话,在宏观经济向好、国际局势稳定、西方经济持续转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房价繁荣取决于两个铁律:一是有没有可持续增长的产业,二是有没有实现人口集聚的能力。

当然,未来不动产登记、房产税征收、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对于房价会产生冲击,但这也都需要时间,短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房价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意见最大的是数量惊人的中低收入者,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这个数字还会上升。《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商品房采取更加务实、科学、理性的调控政策之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将以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为目标,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今年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并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

这意味着中国住房将实现双轨运行:中低收入者靠政府主导的保障房,中产以上人群靠市场化的商品房。后者会进一步提升购买保有成本——房产税的征收就是一个明确信号,唯愿这些税收能为保障房建设雪中送炭,而不会变成地方政府楼堂馆所的财源。因此,在保障房建设分配过程中,高需严格的制度保障,尤其是监管和问责。

其实,要真正缓解困扰中国的住房供需矛盾,根本还在于在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真正提高国民的收入,尤其是完善国家福利制度。只有缓解了百姓看病、养老、教育、后顾之忧之况,住房才能彻底摆脱投资投机,回归居住基本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价能否回归理性,是中国当下深化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成果的一个关键试金石。但不管怎样,中国房价的疯狂时代正在悄悄谢幕。 石述思